苦涩的晚宴揭示欧洲对美国“捅刀子”的愤怒

■ 国际锐评

当地时间21日晚，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设宴招待了众多欧洲企业家。爱立信、沃尔沃、联合利华等企业高管都位列席间。不过，这不是一场喜庆的晚宴，而是一次苦口婆心的挽留。马克龙只想向他们传递一个信息：留下来，不要走。

次日，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一场发布会上慨叹：“就在我们眼前，美国在自己土地上发展本土工业。我们必须更坚定地捍卫欧洲企业利益。”如今，法国乃至欧洲的政客们比任何时候都担心企业离开欧洲，担忧欧洲的工业体系被美国挖空。

由于欧洲能源价格飙升、生产成本抬高，欧洲企业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根据法国冶金工业联盟主席埃里克·特拉皮耶的说法，天然气和电力账单可能平均“上涨四倍”。而美国能源价格相对稳定，加上利用《通胀削减法案》给予本土企业慷慨补贴，欧洲企业不得不无奈“倒戈”，纷纷流向美国。

在德国，大众汽车宣布扩张在美业务；在法国，最大炼铝企业敦刻尔克宣布削减20%的产量；在荷兰，化肥公司OCI正投资数亿美元在美建厂……“工业正逃出德国！”德国《商报》警告称。

欧洲去工业化风险加剧，这令欧洲决策者们痛心不已。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结果却沦为最大受害者。而在大西洋彼岸，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却隔岸观火，还利用欧洲深陷能源危机薅了把羊毛。比如，价值6000万美元的液化天然气，运到欧洲却卖2.75亿美元，涨幅高达三倍多。

不仅如此，美国还往欧洲的伤口上撒盐。今年8月，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为本土电动汽车提供高额补贴，却把欧盟、日、韩等国企业排除在外。在不公平条款下，欧洲电动汽车产业的吸引力减弱，相关企业纷纷流向美国。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清：从利用俄乌冲突阻遏欧洲战略自主，到借能源危机大发横财，再到掏空欧洲制造业喂饱自己，美国原来打的是这些算盘！有网友评价说：“这不只是在吸欧洲的血，也是在割欧洲的肉啊。”

回过神来的欧洲愤怒了。马克龙批评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直言，美国正在搜刮欧洲。欧盟官员也纷纷指责美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当地时间22日，法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保护欧洲工业并联合抵制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美国打造的盟友体系就是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的工具。从利用“长臂管辖”打压法国阿尔斯通等企业，到征收知识产权关税、削弱欧洲制造业竞争力，再到向三星等企业强索芯片供应链机密数据……美国对盟友的打压从来没有手软过。正如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所说，美国是“帝国资本主义”，通过种种手段“剥削其他国家来生存和发展”。

欧洲被捆绑到美国权力的桅杆上，一次次印证了那句话，“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在这方面，法国尤其深有体会。去年9月，美英两国联手截胡了法国与澳方签订的660亿美元核潜艇大单，对法国“背后捅刀”。马克龙愤怒地表示：“欧洲人必须丢掉天真。我们需要表明有能力保护自己。”

痛定思痛，欧洲国家开始抗争。比如，针对美国拉拢盟友打压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做法，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称，美国不能对荷兰发号施令，荷兰不会“一比一照搬美国措施”。同时，欧洲多国发出反对“脱钩断链”的声音。这说明，经过认真考量，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做出越来越理性的选择。

反观美国，霸道的“美国优先”战略正让盟友渐行渐远。欧洲国家正在努力打破“随美起舞”的惯性，寻求战略自主。爱丽舍宫的晚宴就是一个明确信号。

台湾选战看“蓝绿白”交锋

■ 廖省：林越

今年11月26日，台湾将举办县市长选举，国民党24日发布最后的竞选广告，号召民众踊跃投票，让失能的蔡政府下台；并计划从台北带动全台湾“蓝军”的胜选气势。

台湾政论员郭正亮表示，本届“九合一大选”对比2018年选情有2大变数，首先，投票人数减少，例如台北市因部分海外人士未返台而被除籍，降到13万人，受除籍影响最多的是国民党。其次，政党基本盘都缩小，中间选民大量增加。“蓝军”要有准备。

民进党2020年大选时，在30岁以下得票率超过8成，但今年选战，黄珊珊在30岁以下支持度一直领先，而陈时中在年轻群体的票数搞不好只有3成。不过，年轻人未必会积极去投票，对比政党服从性很高的60岁以上群体落差极大，会造成不可预期的因素。

台湾“九合一”选期将至，岛内各主要政治势力展开激烈角逐，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根据选情分析，目前岛内多数县市选情稳定，仅部分选区战况胶着、呈现缠斗态势。

此次“九合一”选举最重要、最受关注的是22县市长选情，蓝绿版图变化是重点。共有95位候选人竞争22县市长之位，国民党、民进党之争依然是选战主旋律。国民党在多数县市选情明显占优；民进党在南部4县市有稳定优势，维持蓝绿主导的格局。

“六都”是此次选举蓝绿白的重心所在。绿营台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陈其迈，蓝营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均寻求连任，都以绝对优势领先竞选者，胜选大势底定。只有台北、桃园是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的决战区，是蓝绿白成败的关键指标。

台北的蓝营基本盘稍大，蒋万安利用“正蓝”的身份由资深民代带领拜票，吸引蓝军归队，采取“少犯错”的策略降低选举热度，目前效果较好。国民党在选战中主攻陈时中，保留黄珊珊的支持者回流的空间。陈时中凝聚绿营基本盘，但因防疫问题，民调高开低走。

11月5日，台北市长选举唯一一场选举电视辩论会之后，TVBS针对三人表现做了民调，蒋万安35%，陈时中28%，黄珊珊19%。这次辩论会为蒋加分不少，进一步稳定选情。但三强鼎立局势仍然荣易生变，蒋万安应该稳扎稳打，很大可能会锁定胜局。

桃园选情的转折点在于林智坚因“论文抄袭案”退选。民进党“立委”郑运鹏仓促上阵，原“立委”郑宝清脱党参选，选情重新洗牌。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民调一直以10%上下的优势领先郑运鹏。郑运鹏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固桩，但最近发生的负面事件对郑文灿不利。郑宝清在近期民调票数浮动不大，民众党赖香伶在桃园根基不深。

目前，除“六都”之外，其他16县市中追求连任的选情基本已尘埃落定。11月2日，无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黄绍聪去世，嘉义市延至12月18日选举。但对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黄敏慧影响并不大。科学园区的新竹市人口不足五十万，高知分子的第三势力发展茁壮。此次民众党推出的高虹安、民进党籍沈慧虹、国民党籍林耕仁均有实力，形成蓝绿白“三足鼎立”，加之前市长林智坚“论文案”的效应，新竹意外成为选战的“焦点”。

根据评估，国民党可能获14–16席，版图或略有扩张。民进党得4–6席，版图有所缩小。包括台南、高雄、嘉义、屏东。若台北、桃园或新竹选情逆转，民进党也有可能翻盘取得其中两市执政权。民众党大概率取得新竹市席位，无党籍预估将取得苗栗席位。

《亚洲周刊》第48期“笔锋”刊文《选战不只选战　攸关蓝绿接班》评论：“九合一大选是蓝绿政治板块移动的关键一役，也是2024总统大选前哨战，攸关蓝绿阵营内部接班势力的消长。更是各阵营中生代接班顺位和派系争夺资源的一场决战。”无论26日选举结果如何，民进党主要派系的实力人物都将会启动接班的安排。由苏贞昌掌控多年的行政院进行改組，更是“九合一大选”后民进党无论胜败都必须进行政治调整的机构。

若26日获胜，蔡英文会选择能继承其意志者作为接班人，而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就可能提早出局。如果选战大败，蔡英文就必须修正她的路线，提前跛脚，民进党内群雄并起，最终可能由声势最强的赖清德出马，或者是分裂成两组阵营角逐2024年的大位。

即使此次“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获得多数县市执政权，并不能因此推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走向。回顾2020年大选，民进党以“芒果干”“抗中保台”的宣传攻势，在境外势力的羽翼下实现“大翻盘”，击败了“民心涣散、士气不振”的国民党。本届“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大选”是钟摆效应还是骨牌效应，国民党决不能再大意了。

记《风雨岁月赤岛情》的题外声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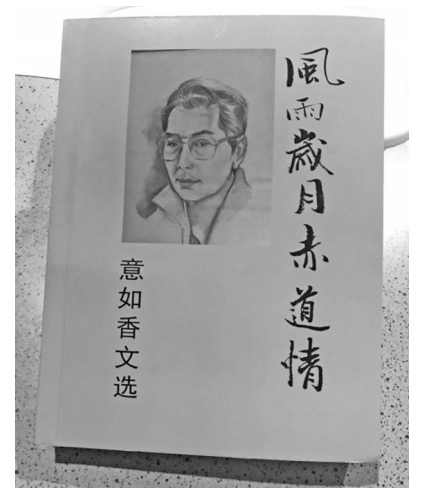
泗水：吴开森

意如香老师在文学界享负盛名，是文坛宿将，其著作厚重，评析独到，有口皆碑。我们从主流媒体及主流方家为新着撰写的序言或评述中，虽然并非极尽详细，但已约略知悉文集内容囊括并收录了诸多文体与政情时讯，涉猎面广泛，有极强的可读性，所以，著作面世之前已于文友间广为传闻，成为大家的梦寐渴求，我亦为之企盼已久。

其实，我未曾认识、面晤意如香老师之前，早在十数年前，当我藉由兴趣初始涉足文学领域时，就已经先从报端阅读到攸关意如香老师在文坛的动向与名声。依稀还记得，报章那次好像是报道意老师身为文界某要员正于国外出席国际文坛的一场活动。

当时，切实未曾想到，我有朝一日竟然会结缘这位文坛巨匠，并有幸得到他的谆谆教诲与提携，让我获益匪浅。本来，人生无缘时，唯有擦肩而过；当缘分所至，则不以山海为远。那天，我们终于在参加“文友一家亲”的年度集会上，就近在咫尺见着了。初次近身接触，影响感人至深，当时丝毫无异于通常文友，意老师面像和祥，谈吐平和，异于当我们初会某方大家，觉察其言谈有时或会有意无意透露让人感到有点晦涩、高企的辞语。所以，我们和意老师能够无拘无束地交谈，气氛很是融洽闲适，临别前，意老师还郑重地向我说：“我们相约20年。”是的！20年里，大家再会总有期。

现在，就让我把话扯回原题吧。今年年中，我出国复诊前夕收到了夏之云老师赠阅的新着《诗岛拾韵》，正汇神赏阅佳诗美韵之际，却又传出喜讯，其夫君——意如香老师新著《风雨岁月赤道情》亦会接而出炉，这无疑正是“妇唱夫随、佳讯频传”，堪为文坛一段佳话。顾念意老师、夏老师贤伉俪对文学均有出奇的同一爱好，他们



日日相濡以沫，家庭中处处溢满书香气息；相互熏染间，肯定会在日日的切磋中创新出更高一阶的文学阁楼。我们同样作为文学爱好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感知其文学造诣，以及汲取其中蕴含的文学营养，谨诚心地祝愿，一对印华文坛的亮丽文星配偶将会永恒光照文学寰宇！

话说，当文界朋友们刚传出意如香老师的新着《风雨岁月赤道情》即将出版，早已引发众人关注，印度尼西亚三语学校协会主席陈友明博士已托付开明三语学校的陈淑莲校董：他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椰城大使馆很期待各分得一本文集。十一月初，我刚由星洲返泗的次日大早，承汪云道老师不辞辛劳，亲自送上了三本新著，我心里非常感激。谨此，我特别感谢意如香老师和汪云道老师，两位老师的盛情厚意和诚挚友谊令我难忘。感恩大家！

当日，陈校董得我通知后，即差员工来我家领取两本《风雨岁月赤道情》，并即刻寄往普沃格多市三语学校协会处，我们理解人们对好的文集，大家普遍有着先睹为快的意愿。

“风雨岁月赤道情，历经沧桑‘意’犹深。”

汉学家（3）

达哈纳（A. Dahana）、约翰尼斯·赫尔利安多（Johanes Herlijanto）

一直到19世纪末，汉学的发展始终与基督教传教活动息息相关。直到约190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设课程介绍中国历史后，这门学科才不再与宗教利益相挂钩。自此，汉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依靠现代的方法论逐渐发展起来。在西方世界，教授与学生参与汉学研究的相关项目也被认可是学术活动。汉学，成为一门全方位研究中国的人文科学。根据时代特征，其早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古代历史，儒家经典以及其它哲学学派。在传统汉学研究中，语言学作为文本研究工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门研究中国文化、古代历史以及儒家经典的学科，传统汉学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汉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汉学这门学科已经过时，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当时的中国日新月异，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探寻实践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此时的汉学家们则还在忙着讨论儒家经典文化以及其它的中国古典著作。同时，一些针对汉学的批评声也随之而来，汉学研究被认为是在培养通才。确实，根据汉学的字面含义，这一学科就是在研究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因此，从事该学科的研究者们自然要求掌握中国的社会文化通识。要成为一名汉学家，其条件确实苛刻，因为它意味着要全面了解中国，包括文化通识、社会形态、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法律制度。

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批评，一些热衷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调整研究方向，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此外，他们格外关注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课题。随着当代中国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一新术语开始出现，然而该术语直到40多年后才与“汉学”一样流行。

20世纪50年代这十年可谓是中国研究开始腾飞的时期，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使用开始比“汉学”更为频繁，人们反而更多地将“汉学”同中国的传统研究联系在一起。相反，“中国研究”则专门研究现代的中国，尤其是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取得巨大的飞跃。这一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当时世界政局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冷战的对峙。美国以及其它西方阵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作为领导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具有扩张性的，即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由于当时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牢牢掌控在莫斯科手中，因此，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怀疑中国正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负责把亚洲共产主义化。后来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爆发更是加深了西方的这种疑虑。甚至有观点认为，由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均为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这种战略上的一致性已使两国之间做好了“分工”，即由苏联负责向欧洲与其他西方国家传播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负责在亚洲地区进行传播。

尽管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中国处于自我封闭并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境地，然而其语言文化与特殊的文字书写乃至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一身份，都使其深受研究者的青睐。中国研究成为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工具。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各国政府都需要中国问题专家的协助分析；同时为了更好地制定针对中国的各项政策，各国政府也需要征询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问题的相关知识不单单应用于政府对外政策及战略的制定上，也逐渐成为各大研究机构与高校热门的研究课题。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实际需求，这段时期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由于1949年后，研究中国国内发展状况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国家的高校和学术界也开始大力调整该领域的研究。现代的教学方法被应用于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当中。私人企业以及政府也陆续参与其中，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政府和私企的资助下，许多高校开展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起初，所谓的“中国研究”仅限于对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学习，后来“现代中国研究”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人文科学界的其他研究领域，如政治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容易就能够把中国研究涵盖其中，而政治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比较难的是同经济学挂钩，因为当时的经济学，无论从研究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上来看仅适用于分析发达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但在后来出现的经济发展中，中国这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发展经济建设理论以及比较经济学的模型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间，中国研究的发展更为迅猛，甚至影响到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文科学以外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研究的现代化与普及化，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切都受到了关注，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天安门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那些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课题。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